

拜德雅
Paidia

L'art d'aujourd'hui L'anthropocène

Bernard Stiegler

[法] 贝尔纳·斯蒂格勒 著

人类纪里的艺术

斯蒂格勒中国美院讲座

主编：黄孙权

陆兴华 许 煜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人类纪里的艺术

斯蒂格勒中国美院讲座

[法] 贝尔纳·斯蒂格勒 (Bernard Stiegler) 著

陆兴华 许煜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纪里的艺术：斯蒂格勒中国美院讲座 / (法)
贝尔纳·斯蒂格勒 (Bernard Stiegler) 著；陆兴华，
许煜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11
(腮红猫丛书)

ISBN 978-7-5689-0248-9

I. ①人… II. ①贝…②陆…③许… III. ①技术哲
学—哲学理论 IV. ①N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62323 号

拜德雅·腮红猫丛书

人类纪里的艺术：斯蒂格勒中国美院讲座

RENLEI LI DE YISHU SIDIGELE ZHONGGUO MEIYUAN JIANGZUO

[法] 贝尔纳·斯蒂格勒 著
陆兴华 许煜 译

策划编辑：任绪军 邹荣 雷少波

责任编辑：任绪军

责任校对：秦巴达

书籍设计：偏飞设计事务所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易树平

社址：(401331)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 21 号

网址：<http://www.cqup.com.cn>

印刷：重庆市正前方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9mm × 1194mm 1/32 印张：6.5 字数：140 千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89-0248-9 定价：30.00 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腮 (cyber) 红 (pink) 猫 (cat)，一只被美图 App 处理过的萌宠，是网络无名的表象。我们不迷信表象之下还有真实，但求发掘表象本身的厚度和张力。

腮红猫丛书，既处理数码时代网络社会的技术物质，也分析网络文化的美学、新媒体社群关系，更是对人类纪理论之偏离和更新。“腮红猫”是当下人类生存状态的集线器。

丛书下设三个系列：

猫腻媒体：聚焦媒体理论，媒体必然包含猫腻，媒体就建立在人类的猫腻（漏洞）之上；腻作为动词也正指出人类与媒体、媒介的关系。

猫在社会：从社会学的角度回应网络社会遭遇的范式转换，试图以另类 / 另立的视角反观社会现实。社会被技术力量重新塑造，新政治、新经济、新社会亟待新的自我理解。

猫玩技术：从哲学的角度反思技术，确切说来是从技术角

度反思哲学中人类中心主义和形而上的顽疾。与其说用哲学来研究技术，不如说哲学（对存在的发问）就是人与技术互动的产物。

中国美术学院 跨媒体艺术学院 网络社会研究所

[编按]	001
--------------	-----

写在前面的话

[序言]	003
--------------	-----

哲学作为武器 许 煜

[导论]	021
--------------	-----

克服技术-书写的毒性

——斯蒂格勒论数码性与当代艺术 陆兴华

无产化状况下的审美判断

035	感性的无产阶级化
059	审美判断引向个体化过程
079	业余爱好者的争论
101	自动化社会里的超控制艺术

人类纪里的艺术、差异与重复

123	梦的器官学与元电影（上）
133	梦的器官学与元电影（下）
149	书写的屏幕
161	快感、欲望和默契

[附录]	177
--------------	-----

为一个负熵的未来

写在前面的话

贝尔纳·斯蒂格勒是当今法国文化、艺术界最活跃的人物之一。他的研究跨越经济学、哲学和艺术等多个领域，被誉为“德里达的接班人”，但他自己却并不认可这样的说法。他的代表作《技术与时间》三卷本，“重新确立了技术在哲学领域的地位”。同时，他还担任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的文化发展总监，致力于从“技术”中发展出当代文化艺术和政治的新机遇。

斯蒂格勒是一个极具个人调性的哲学家，其工作区域远远跨出传统的欧陆哲学范围，在技术、媒体和艺术研究方面独辟蹊径。他提出了“技术就是人”这一纲领性准则，这一立场展示出了他与海德格尔等哲学前辈的巨大分野。近年来，他重新反思弗洛伊德、胡塞尔、海德格尔、西蒙东、德里达、马尔库塞和利奥塔的思想，对新技术、新媒体、新农业、新工业和新艺术提出了一整套激进理论。斯蒂格勒对教育、金融、消费、互联网、转基因、新农业、审美苦难、新媒体毒性等问题的研究，使其成了目前媒体研究领域最重要的作者。

这本小册子囊括了斯蒂格勒教授受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视觉中国研究院,以及同济大学欧洲文化研究院的邀请,于2015年2月26日至3月4日和2016年3月17日至20日,两次访问中国美术学院所作的关于数码时代普遍无产化状况下的审美判断(第一部分)和元电影、书写、屏幕与欲望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分)的系列讲座;以及2015年3月6日在南京大学所作的关于如何克服我们身处其中的“人类纪”的讲座发言(附录)。我们邀请陆兴华教授与许煜博士将斯蒂格勒教授的讲稿翻译为中文(其中,第一部分和附录由陆兴华翻译、许煜审校,第二部分由许煜翻译),并以许煜的《哲学作为武器》作为前言(由此可概览斯蒂格勒的哲学全貌),以陆兴华在接触斯蒂格勒之后的思考和工作《克服技术-书写的毒性》为导论。几场讲座中既包含斯蒂格勒最新鲜的思考与批判,又牵引出他庞大深厚的哲学框架和系统。本书意在进一步扩展国内学人对斯蒂格勒的理解(目前国内只出版了他的《技术与时间》三卷本),进而增强观察和批判中国当下的网络社会新状况的武器。

哲学作为武器

许 煜

2008年我在伦敦邂逅贝尔纳·斯蒂格勒，几个月后他邀请我到他在巴黎组织的一个研讨会上演讲。自此之后的几年，我们进行了很多合作，包括他作为我的博士论文导师。斯蒂格勒是一位传奇式的哲学学者。在大学的哲学系有很多哲学老师，但他们往往只生活在一个系统化的哲学知识的框架里，往往争论的是哲学史的问题，而不是哲学甚至生命本身的问题。斯蒂格勒很迟才开始学习哲学，而他正式学习哲学则是在监狱里。1978至1983年，斯蒂格勒因为抢劫银行，被判入狱五年。在此之前，他在图卢兹开了一家爵士酒吧。服刑期间，他开始学习哲学，后来在德里达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他历任法国国立视听中心 (INA) 和声学与音乐研究中心 (IRCAM) 的主任，现在则是创新与研究所 (IRI) 的主任。2010年斯蒂格勒在法国中部小镇埃皮纳伊莱弗勒里耶成立自己的哲学学校。

1. 存在与生成

2003年,斯蒂格勒在一个讲座中回想这段经历,这可能也是他第一次公开地诉说这段历史。¹我们可以想象他当时的生活。每天起床读马拉美,听收音机,开始阅读及反思哲学,也在这段时间通过对柏拉图的阅读发展出“错失”(défait)的概念。在这段平静的生活中,他找到了一种“自由”,他开始害怕亲友的探访,因为这些探访让他想起外面的世界,这在滋扰着他的宁静。如果我们细想,这正是现象学所说的悬置(époché),如胡塞尔所言,将所有的偏见悬置,我们才能逐渐地由一个超越的自我的角度观察现象,并将其作为所有科学的基础。海德格尔在1927年出版的《存在与时间》中便将悬置应用于存在分析,亦即怎样从众人纷扰的世界(das Man)回到真实的自我。狱中的环境便像一种天然的悬置(epoché),将自我的“本真性”(Eigentlichkeit)显露出来。然而这始终不是“自由”,而是一种脆弱的存在,一种蔑视众人的存在。最后,斯蒂格勒并没有成为海德格尔的信徒,相反,在他的写作中他认为海德格尔因为没有真正地处理技术的问题,所以他无法真正处理存在的问题。海德格尔指出,西方两千多年的形而上学忘记了存在(Sein)的问题,而只专注于“存在物”(Seiendes)的研究,现代科技(有别于技术和科学)正是这种形而上学的最高体现。在著名的《技术的追问》中,海德格尔指出现代科技的最大问题是它形成了一种形而上的框架(Gestell),而人和自然则变成了可随时被剥削和利用的储备(Bestand)。斯蒂格勒则批评海德格尔忘记了忘记,这第二个忘记

1 Bernard Stiegler, *Passer à l'acte*, Paris: Galilée, 2003.

便是爱比米修斯的过失。

在《技术与时间（卷一）：爱比米修斯的过失》¹中，斯蒂格勒重新诠释巨人普罗米修斯及爱比米修斯两兄弟的神话。普罗米修斯有一项责任就是将不同的技术分给万物，他的兄弟爱比米修斯自荐要做这项工作，最后由普罗米修斯检查。我们要留意爱比米修斯的名字意为“后知后觉”，这位常常被赋予诙谐角色的巨人，将所有的技能分给万物（例如，豹子跑得快，兔子和老鼠可以轻易地钻洞）之后，他发现人类站在森林的中间，赤身裸体没有羞耻地等待。他们什么技能都没有，只有在那里等死。于是普罗米修斯从奥林匹斯山的神那里偷来了火。有了火，人类可以忍受寒冷的长夜，吓走饥饿的狼群和老虎。有了火，人类开始他们漫长的文明，一段关于技术的历史。这便是斯蒂格勒所言的“本原的缺失”（*défaut d'origine*），也就是说，人类一开始是没有本质的存在，作为技术的火给了他们本质；同时它也是必要的错失（*défauts qu'il faut*），亦即人类之所以是人类的问题，这也构成了“存在”（*être*）与“生成”（*devenir*）的问题。如果传统的存在论（*ontologie*）强调的是事物存在的状态，如时空、外表、性质，那么生成便是要对抗这种固定的结构，而强调存在必定是一种生成。这种生成对于斯蒂格勒来说一方面是因为“本原的缺失”；另一方面是因为“偶然”，技术、科技的出现近乎偶然，而他们对生成造成的影响也几近偶然，亦即它所造成的生成都是在预定的功能以外，如一种满溢。

1 Bernard Stiegler, *La technique et le temps, tome 1. La Faute d'Épiméthée*, Paris: Galilée, 1994.

2. 时间与记忆

正是由这个神话开始，技术构成了斯蒂格勒的思想的核心，技术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个哲学要处理的物件。相反，他的计划更宏大，他认为哲学问题便是技术问题。对斯蒂格勒来说没有技术（也就是没有火）便没有时间，也便没有存在。如果海德格尔尝试以时间作为存在分析的基础，那么他的分析的最大问题，便是没有将技术放在存在分析的核心，相反技术作为海德格尔所说的“本体神学”的体现，变成了存在问题的障碍。斯蒂格勒并不只是以人类学的角度去回答海德格尔，而是进入形而上学的历史。

他尝试在哲学史中找到这个“哲学的本原”，而这便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在《意外的哲学思考：与阿兰·杜灵对话》（*Philosopher par accident: Entretiens avec Elie During*）中，斯蒂格勒描述了这个计划，以及自己的历程，包括作为技术工人的父亲在他小时候对他的教导，以及他对柏拉图的理解。我们可以说斯蒂格勒的批判在于对“回忆”（Anamnèse）的理解。¹在《美诺篇》中我们读到苏格拉底与美诺的对话，亦即著名的美诺悖论。苏格拉底以他惯常的手法在路上拦截了美诺跟他讨论美德的问题，美诺这样问苏格拉底：

“我亲爱的苏格拉底先生，你拿我开玩笑吧。因为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你不知道美德是什么，就算我们真的找到了它（先让我们假设这是可能的），你也认不出它。也就是说，它可能就在你的眼

1 贝尔纳·斯蒂格勒，《哲学与技术》，许煜译，王舒柳校，《热风学术》，第8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289-309；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作为记忆》，许煜译，《新美术》，2015年06期，62-69；两篇译文均选自《意外的哲学思考：与阿兰·杜灵对话》，全书将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前,可你却不知道你已经找到了它。第二种可能就是,你的确认得出它,这就说明你早就知道它是什么。如此说来,你根本不用寻找它。你只是假装寻找它。”苏格拉底的解答也一样精彩,苏格拉底说:“是的,我们一开始认得它,但在我们转世的过程中,我们忘记了,而现在我们便要在我们的记忆中寻找它。”我们要留意对于柏拉图来说,回忆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回忆便是知识固结 (concrétiser) 的过程,也是真理显露的条件,如果我们同意真理需要稳固的知识为基础。

然而在《斐多篇》中,我们看到另一个对话,那是关于创造书写的神图提 (Theuth) 与埃及法老塔穆斯 (Thamus) 的对话。当他们谈到书写的时候,塔穆斯说:“技术的创造者本身并不能很好地判断他的发明对其他人来说是否是好的。这回,你是文字的创造者,你对它会像你对孩子的爱一样觉得它们有一些事实上不存在的素质;而你的创造将会引致学习者灵魂的失落;他们将会依赖外置的书写,而不去记得它们。”技术,是记忆的技术 (Hypomnēmata, 意为“失忆”),也是短路的工具,因为他们将记忆外置,而不需要再用心去记忆,亦即回忆的消失。这对于柏拉图来说是真理的隐藏。然而,斯蒂格勒想要证明的正是,记忆的技术在古希腊哲学中,至少在柏拉图的思想中,是哲学的首要问题。而这便是斯蒂格勒所说的“第三持存”,如果我们以海德格尔式的口吻来说,即西方形而上学自柏拉图之后便忽略了“第三持存”。

持存 (Retention) 一词来自斯蒂格勒对胡塞尔的《内在时间意识现象学》¹ 的阅读。胡塞尔分析了两种持存。譬如说,听音乐,

1 Edmund Husserl, *Vorlesungen zur Phänomenologie des inneren Zeitbewusstseins*, Halle: Max Niemeyer Verlag, 1928. 此书是胡塞尔 1905 年的授课内容,后交由海德格尔编辑成书,迟至 1928 年才出版。

我记得一秒之前的旋律,因为这种短暂的记忆我可以感受到整首歌曲所表达的情感。但这种记忆并不持久,它是第一持存。如果明天我还记得这首歌曲的话,那即是说第一持存已转化成长久的记忆,亦即第二持存。而我们听的录音带、光盘、MP3便是第三持存。今天我们的第一持存、第二持存很明显都由第三持存所控制,如斯蒂格勒常常举的例子,十年前我们都记得父母的电话号码,但今天我们都不会记在脑海里而是储存在手机中。柏拉图批评书写,但柏拉图这个名字也是因为书写这个“第三持存”才留下来,同样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卷三):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¹中指出,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因为康德对于认知的三重综合的理解(直观中领会的综合,构想力中再生的综合,以及概念中辩认的综合[*apprehendierende, reproduzierende und rekognoszierende Synthesen*])中并没有留意到辩认(*rekognoszieren*)也需要第三持存作为记忆的支持。我们要留意的是这种第三持存,所持存的不只是记忆,而且是姿态。人类在使用器具的过程中,发展了双脚与前臂的分离,这也是技术的记忆性,斯蒂格勒在这方面深受古人类学家安德烈·勒鲁瓦-古汉(André Leroi-Gourhan)影响。这也是为何斯蒂格勒将工具视为义肢,亦即一种人造的器官,故此他提议必须发展一种普遍器官学(*organologie générale*)。

1 Bernard Stiegler, *La technique et le temps, tome 3 : Le temps du cinema et la question du mal-être*, Paris: Galilée, 2001. 此处沿用已有中译本的书名译法,但需要提出的是,“mal-être”并非“存在之痛”,而是“不适”或“苦恼”之意。

3. 技术与工业

这个将哲学问题与技术问题等同的计划，显然一点也不容易，首先斯蒂格勒需要跟学院式的哲学对抗，这也是为何他这么多年来在法国只是任教于一家可以容许不同实验的技术大学；其二他必须仔细地研究当今的技术发展，以思考科技在今天的意义，而不是一种永远如是的“本体意义”，因为第三持存并不是以同一个状态永恒地存在。这也构成了第三持存的政治性，也是我认为斯蒂格勒与一般哲学学者不同之处，亦即如何进入工业的研究同时对工业进行批判或者重新引领。斯蒂格勒在法国成立的组织工业技术协会（Ars Industrialis）集合了不同背景的人士，如工程师、哲学家、经济学家等，联合研究和寻找一种新的工业精神。而他2006年在巴黎蓬皮杜中心成立的创新与研究所则致力发展新的软件，以实现他的哲学思想。

今天科技问题无疑便是工业问题。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描述了由科技推动的现代工业所造成的异化。因为矿产的发现，农民失去了土地，最后要到工厂工作。工匠们世代所传下来的技能原本足够他们维生，但是因为机械式的大量生产，他们的技能已沦为过时，最后也不得不放弃他们的生活而加入工厂的工作。劳动力仅成为交换价值，以换得面包和牛奶。在工厂里，他们要跟着机器的节奏，将他们自主的身体交给了机器的自动化，亦即他们成为被动的、提供能量的个体。斯蒂格勒视这种“知识的流失”为“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tization）的过程。中文将“proletariat”译成“无产阶级”或“贫民”其实并不十分准确，事实上，无产阶级化并不是

使人变穷而更像是“废人化”。斯蒂格勒的解读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相异，他们不少人至今仍然视“劳动阶级”为proletariat。斯蒂格勒视“废人”为那些失去知道怎样做 (know-how) 的知识 (savoir faire, 实践的知识) 的人，因为他们不再拥有可以自给自足的知识，他们也失去了生活的知识 (savoir vivre)。这是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以来，人类状况的第一个灾难性的结果，他远比经济意义上的危机（累积的危机）更加严重。而19世纪以降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已几乎控制了所有不同行业的生产。

但资本主义并不能松懈下来，它必须制造消费，否则累积的危机只会继续下去，而资本的流通也将会缓慢下来。当工人无法在工厂里获得生活的知识，他们只有在空闲的时间去创造一些另外的东西，这为资本家打开了一个广阔的可操控空间。在20世纪之初，公共关系学之父爱德华·伯内斯 (Edward Bernays) 将精神分析引进了营销技巧，并将商品经济和“力比多经济” (Libidinal Economy) 结合。那些常常嘲笑将广告“精神分析化”的犬儒主义者或者憎恨一切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人，如果知道其实伯内斯是弗洛伊德的外甥之后，可能会稍微改变看法。伯内斯雇用了一些精神分析师加入设计营销策略。其中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推广香烟产业，那时美国吸烟的人口主要是男性，女性并不视吸烟为一件有趣的事。伯内斯于是雇用了一批女明星在公众场合吸烟，吸烟因此成为了一件性感的事，挑动着男女之间的欲望，这也是商品与力比多投资的结合。一年之后，香烟的销量增加一倍。今天我们见到的例子当然不只是香烟，而是所有的商品。今天我们见到的是身体与资本结合的一条条新的线路，先是劳动力的剥削，然后通过操纵工人的欲望而加快流通

的过程。

这对于斯蒂格勒来说也是一个美学与技术的问题：市场营销的美学。今天我们见到广告、营销迅速地将设计、艺术吸纳进商品的包装，以此来吸引人们多消费。在消费主义的时代，我们见证着符号的贫困，因为符号的意义变得越来越纯粹，亦即消费的符号。在《论象征的贫困》（卷二）（*De la misère symbolique*, Tome 2）中，斯蒂格勒写道：

人类美学的历史包括了一系列连续的失调（*désajustement*），这些失调存在于三个构成人类美学力量的大型组织之中：生理组织的身体，人造器官（比如技术、对象、工具、仪器、艺术品）以及由前二者相互协调而构成的社会组织。我们必须想象一种普遍器官学，这门学科专门研究人类美学三大方面的历史，并研究三者相互关联所引发的冲突、创造和潜力。以上这些就是我正在构思的理论的主要框架。只有这种系谱式的研究方法才能让我们理解美学的演变，当代的符号贫困就是美学演变的产物——从中，我们应该希望并且肯定，技术和科技所带来的无限可能中蕴含着一种新的力量，而这种力量也同样隐藏在（饱受符号贫困之苦的）情感之中。¹

象征的贫困相应的结果便是力比多经济的灾难，消费将欲望变为类似于毒瘾的癖好，亦即一种依赖。存在变成了一种病痛，亦

1 贝尔纳·斯蒂格勒，《论符号的贫困、情感的控制和二者造成的耻辱》，许煜译，王舒柳校，《热风学术》，第8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289。